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八三期 ——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1c)

【史林一页】	文革初的中宣部	郝怀明
【当事者言】	我和“三家村”	李 筠
【史海钩沉】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	倪天祚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林一页】

文革初的中宣部

• 郝怀明 •

◇ 中宣部对《海瑞罢官》的反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点燃了。

对姚文元文章这种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批判，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仅《文汇报》就收到读者来信来稿3000多件，大多数都不赞成姚文的观点。我周围许多同志都不赞成姚文的观点，我也非常反感，觉得姚文太过分，太可怕，太不讲道理。后来知道，陆定一、周扬也不赞成姚文。陆定一说：“姚文元的文章如果没有最后一部分（按：即诬《海瑞罢官》反党反社会主义部分）就好了。”“吴晗问题一讨论，提出好多问题，清官问题，道德问题，历史人物问题，等等，搞不清楚。”“政治上给人家戴个帽子，人家不敢说话了，我们取得阿Q式的胜利，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周扬说：“姚文元的文章，社会上反映很大，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篇文章这样写好不好，还难说。吴晗主观上到底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还不一定。艺术家写东西不一定直接和当时的问题相联系，而是一种思潮。一定说《海瑞罢官》是一个什么具体事件，也不是，而是那几年，他们有一股气，不满意。”副部长许立群、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理论处处长陈

道、宣传处处长王宗一、理论处副处长洪禹等也不约而同地表示，姚文把《海瑞罢官》与“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是“生搬硬套”。12月7日，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刊登了上海知识界对姚文的反映：“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织，陷人于罪”等等。从上到下，部内部外，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基本相同或相近，对姚文均持否定态度。

按照当时党中央的规定，批判吴晗这样全国知名的学者，又是北京市副市长，必须经中宣部批准，并向北京市委通报。可是毛泽东躲在幕后，不按常规出牌。由于对姚文社会普遍反映不好，因此在姚文发表后半个月内，除中共中央华东局控制的华东地区几个省外，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在内，因不明底细，均未予以转载。

◇ 从强烈抵制到“和而不同”

当初，《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曾向中宣部、文化部四位部长、副部长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要批判。但江青既没有说是奉毛泽东之命而来，也没有透露毛泽东有这个看法。这样，几位部长、副部长听了江青的策动，谁都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从思想认识上来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认同江青对《海瑞罢官》那样的看法，何况对吴晗这样的人物，也绝不是江青这个司局级干部表示点不满，就可以兴师动众去批判的。江青在京又找了一位文艺评论家进行策动，也碰了个软钉子，无功而返。

江青是了解毛泽东的心思的。毛泽东把《海瑞罢官》中的“平冤狱”看成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替彭德怀翻案，把海瑞逼迫徐阶“退田”看成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否定人民公社。一个彭德怀，一个人民公社，这是最足以触痛毛泽东的神经的两件大事，不论哪一件都不能“翻案”。他向江青授意，让江青到上海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并全力支持文章的发表，这是他在历史关头做出的一个向所谓“修正主义”“夺权”的重大战略决策。

江青说，姚文的写作是在严格的“对外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要“对外保密”，是因为怕“他们”扼杀。这个“外”和“他们”是谁呢？彭真当然是一位，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等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还包括中宣部、北京市委在内。“保密”保了七、八个月，张春桥往来于京沪之间，名为“搞戏”、“修改音乐”，实则“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据说经过九易其稿，现在终于出笼了。

此时的毛泽东仍然不肯露出他暗藏的玄机，下令各报转载姚文，他要试探各方尤其是上层如何反映。出乎意料，姚文发表后竟然遭到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强烈抵制，包括来自中央领导层的强烈抵制。

彭真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吴晗的问题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来批判。康生起草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1965年9月至10月间”一条下面写道：“毛主席早就觉察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大事记》还说，9月23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中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彭真在看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后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他在家中召集周扬、许立群、吴冷西、邓拓开会，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比较积极。”在这次会上，中宣部有关同志批评上海发表姚文“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因为中宣部曾有明确规定，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对象必须经中宣部批准。

毛泽东见各报不予转载，更加恼火。他在上海发话，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同彭真、陆定一、北京市委、中宣部摆开了一副决战的架势。

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北京新华书店仍因不明就里没有立即回复。直到29日，才复电同意。

11月26日，彭真明确表示：“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态度鲜明，毫不妥协。

11月28日，在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出面协调之后，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问题，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参加会议。彭真问：“吴晗现在怎样？”邓拓回答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彭真的这句名言，掷地有声，后来成了他“露骨地反对毛主席”的“滔天大罪”。会议决定北京各报分批转载姚文，“以避免震动太大”。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加按语转发姚文，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栏里转发姚文，并加了经周恩来审改过的按语，强调指出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我们的方针是：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的按语都是作为学术问题来对待的，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平等讨论，这显然同毛泽东的政治意图是相背的。毛泽东打电话给周恩来只说“一定要转载”，但没有“透底”，他们是按传统的做法，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的。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称《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那是罗瑞卿得知姚文的“来头”后，告诉军报那么写的。

12月1日，彭真召集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开会，说各报都转发了姚文，加了按语，我看还是《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较稳重，军报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太早了。现在各报都转载了，以后是讨论的事情了，讨论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赞成姚文元的，各种意见都登才好讨论，要采取“放”的方针，要组织一些有名人士写文章。彭真特别点名要周扬也写一篇。

周扬立即召集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副处长林涧青还有龚育之开会，决定批判《海瑞罢官》的各项工作由林涧青负责，议定任务有三：一是组织文章；二是审查文章；三是反映有关情况。关于组织批评吴晗的文章，当即议定组织三篇，一篇批《海瑞罢官》，主要由龚育之执笔，另外两篇，一篇批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批吴晗的道德继承观，分别由《红旗》杂志社的戚本禹、关锋承担。

姚文的“来头”如今已经清楚了，知道是毛泽东的意见，中宣部和周扬理所当然要努力跟上，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在于，姚文那样简单粗暴，对吴晗罗织罪名，不论在知识界还是普通群众中都很反感，那么由中宣部和周扬组织写作的这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就要同姚文的那种批法有所不同。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起草组同志设想，主要是影射问题，说吴“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角度来写，还是上到那个纲上，但要写得稍微活泛些。周扬同意这个设想。他还向起草组同志推荐了星宇的文章《论“清官”》，说这篇文章写得好，他送给陆定一看了，陆也觉得好，说比姚文元的文章水平还高，可以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关于影射问题，在起草组讨论会上，周扬语出惊人。龚育之回忆说：“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

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

周扬主持的这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题目是《〈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署名方求，刊于1965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文章最后引了列宁很长一段话：“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459页）当时看了方求的文章，尤其是引用的列宁的这段话，许多人心里感到比较服气。觉得吴晗就像列宁说的那样，他本来要到的房间，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即“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在当时那种情势下，要批吴晗，不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行，只要不说他主观上就是有意有计划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们在心理上似乎就可以满足了。至少在那时的我就是这样。

就在方求的文章发表之前，周扬约略听到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消息，他立即打电话告诉文章作者，要他们在文章中补上几句。即使自己不想讲影射，但最高领袖讲了，还是要紧跟啊。于是，在文章后面加了这样几句批判《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话：“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然而，一切皆是枉然。“文革”中批判周扬和方求文章对《海瑞罢官》是“假批判、真包庇”，是同姚文元文章“唱对台戏”，是一个“大阴谋”。这当然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当中宣部的同志在得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的意图之后，总的来看，无疑是努力紧跟、积极支持的，是真批判，而不是假批判；同姚文元是同唱一台戏，更不存在什么“大阴谋”。要说“大阴谋”的话，姚文的炮制和出笼那才是货真价实“大阴谋”。当然，方求的文章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同姚文元的文章相比较，确实有所不同，比较注意采取分析的态度，说理的方法，不是那样简单武断粗暴，可以看作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是对姚文元文章的匡正，是在当时情势下在这方面所能做出的一点有限的努力。这样，方求文章虽然也是在批判《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但又同姚文元式的批判区别了开来。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建设的负责人30多人参加会议，传达了头年12月21日，毛泽东指出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他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在毛泽东那里，吴晗的问题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学术艺术问题而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来的，现在说得就更加直截了当了。

会上，彭真讲话强调“放”。他说《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妨碍了放”。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对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没有同中宣部打招呼提出批评。他也赞成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彭真、陆定一以至周恩来都是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艺术问题来对待的，这是他们同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和分歧。

党内两种不同意见的较量在激烈地进行着，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 力图遏制“文革”野火的《二月提纲》

1月17日，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报刊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听取关于讨论《海瑞罢官》的情况和问题。会后根据许立群在会上的归纳和总结，写成《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于1月18日上报五人小组。

根据龚育之的回忆，这个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同志提出，今后一段时间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问题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是一些当时觉得比较难以掌握，亟需向上请示的问题。

接着，许立群又陆续送上几个材料。一个是1月26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正月初二他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再一个是1月28日，《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另一个是1月29日，《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郭在信中要求领导批准他辞去一切职务，反映了他的紧张情绪，并按照许立群的意见，整理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作为附件一同送上。还有一个就是1月31日送上的3个材料：《关锋同志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以上材料，总共7个。

1月31日，当汇总为7个材料上送彭真时，许立群还亲笔给彭真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肯定了《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收到的效果，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提出的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提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

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相；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1962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1962年88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说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是《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1959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1959年）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是京剧演员演过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

许立群的这封信，可以说是对7个材料的一个总的说明，也是他对有关问题深入思考之后提出的意见。无疑，这对上级领导掌握情况研究对策有重要参考价值。

2月1日，彭真把许立群的信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吴冷西阅（附材料7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

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出席，周扬因患肺癌住院手术缺席。许立群、胡绳、姚溱列席。彭真让许立群将其信的内容及七个材料的情况在会上作了汇报。彭真在会上说，现已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讲《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应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他主张在学术批判中采取“放”的方针，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要慎重，不要过头。他还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康生在会上讲要批吴晗的“要害”，对其他问题没有表示意见。

陆定一对当时那种极“左”的批判早有意见，他在会上提出要接受斯大林时代的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会后，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许立群和姚溱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后来通称的《二月提纲》）。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开会讨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彭真仍让许立群口头汇报。常委会通过后，彭真又作了修改，并于7日用电话逐字逐句发给了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秘书，呈报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及许立群、胡绳飞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只要毛泽东最后点头认可，这件大事就确定下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彭真仍让许立群作口头汇报。

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赞同《汇报提纲》，但也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毛泽东问彭真，他是否认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又说，如没有证据表明吴与彭德怀有组织上的联系的话，吴还可以继续担任副市长。对这次汇报中毛泽东的态度，及许立群听了之后的反映，当年作为中宣部工作人员随同前往的龚育之在回忆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

“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并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润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删去这两句，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来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

“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数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龚育之著：《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第48—49页）

2月12日，许立群、胡绳遵照彭真的嘱咐为《二月提纲》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送常委审阅，经常委通过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2月18日，许立群、胡绳在京召集宣传部门及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传达《二月提纲》。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大家反映很好。

这个《汇报提纲》是一个处理意识形态争论的指导纲领。它指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承认吴晗犯有政治错误，但坚持认为学术上的争论应该用学术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来解决。《汇报提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点是：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的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汇报提纲》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

很明显，《汇报提纲》的这些重要观点是针对当时已经和正在掀起的“左”的狂潮而提出的，力图将这场大批判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出现更大的社会动乱。

毛泽东早已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以批《海瑞罢官》为由头，以彭真、陆定一、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为突破口，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怎么会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会同意批《海瑞罢官》可以不联系庐山会议呢？但是，毛泽东故布迷魂阵，对《汇报提纲》暂不明确表示反对。他一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叫人摸不清楚他到底是对此表示质疑，还是以反问的口气表示肯定的态度。他又说吴晗照当市长。这样一来，就给彭真、许立群等人造成了某种错觉，误以为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连他的职务也不必变动了。于是，他们如释重负了。

然而，他们错了，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曾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江青面授真经，他说：“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曾问许立群：“杨耳怎么不尖锐了？”许立群在50年代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曾以“杨耳”的笔名写过一篇批判文章，一炮走红，受到毛泽东的赏识，特地邀请他到中南海亲切交谈，要他再写一篇。他果然又写了一篇批判长文。从此大受重用，由团中央调入中宣部，先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然后是处长，随后又升任副部长，并主持常务工作，可谓节节高升，一帆风顺。毛泽东的发问，显然是批评他失去了当年的“政治敏锐性”，没有领会他老人家批判吴晗的政治意图，对他执迷不悟地跟着彭真搞那个《汇报提纲》深为不满。可是，许立群竟没有反应。

就在彭真他们起草《汇报提纲》的同时，在毛泽东的策划下，江青开始了《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炮制。2月2至20日，江青奉毛泽东之命，并得到林彪的应允，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准备向陆定一、周扬以至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大举进攻了。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指出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门1962年被解散）。

几天之后，毛泽东的批评就更严厉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以及江青、张春桥等人分别或一起谈三次话，批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泽东说，1962年十中全会作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泽东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根据就是陆定一、许立群不该说《文汇报》发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应同中宣部“打招呼”，中宣部不应该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暂不发表关锋、戚本禹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其实，中宣部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按党中央历来的有关方针政策办事。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他所认为的那些所谓“修正主义”的领导者一个个打翻在地，他要拿彭真、陆定一这两位大人物，还有已倒的罗瑞卿、杨尚昆来祭旗，为下一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扫清道路。

中宣部厄运临头了。

□《炎黄春秋》2010年12期

~~~~~

【当事者言】

我和“三家村”

• 李 筠 •

史学界关于“三家村”的研究，大致说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主要是辩冤，从事实真相和道理是非说明“三家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而是当时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现代文字狱。此案于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接着，开始了三个人个案研究的阶段，分别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个人经历、学术成果进行收集、整理和评价，出版了《邓拓文集》、《吴晗文集》、《廖沫沙文集》和他们的传记。如《邓拓传》、《吴晗传》、《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以及美国历史学家马紫梅女士的《时代之子——吴晗》等等。在这基础上，开始进入了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即“三家村现象”的研究，把他们三人作为那个时代的整体历史现象，探讨“三家村”怎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三家村”出现的历史背景、时代作用以及“三家村”本身的文化历史价值。花城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关于《三家村文库》（即《邓拓全集》、《廖沫沙全集》和《吴晗全集》）的出版就是一个力的说明，为了促进“三家村现象”研究的深入，我作为当事人之一——“三家村札记”的责任编辑，愿意做提供资料的工作，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三家村”前前后后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提供出来，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

◇ 《前线》创刊的前前后后

提起“三家村”，不能不提到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前线》。这是因为：第一，《三家村札记》是《前线》杂志上开设的一个杂文专栏；第二，“三家村”的“村长”邓拓是《前线》的主编，廖沫沙是常务编委，吴晗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第三，特别是由彭真撰写的《前线》发刊词，与“三家村”有着直接的思想联系。因此，有必要把《前线》杂志的成立和办刊经过作一比较详细的介绍。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加强理论队伍建设，倡导创办理论刊物。通知下发后，中央创办了《红旗》杂志，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创办起一批理论刊物。

根据中央的指示，1958年5月2日，彭真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建立理论工作队伍的决定（草案）》。在这次会上，彭真首次透露了他要办一个理论刊物的计划。彭真说：“北京做了许多工作，有许多典型的经验，没有总结，没有提高到理论上来，北京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不够有力量”，因此要好好办一个理论刊物，否则没法“指导实际工作”。彭真亲自指定市委常委张文松和市委宣传部暂时负责刊物的筹备。

要办刊，首先要解决的是刊名、主编及编委人选、刊物的指导思想。在这些问题上，北京市委给予了高度重视，期望和要求也很高。

7月14日，彭真专门召集市委常委会听取市委宣传部《关于创办市委理论刊物的意见》。当时市委宣传部提出了二三十个刊名，如跃进、公社等，彭真都不满意，要求宣传部再提几个。

在主编人选问题上，彭真考虑到邓拓。他说：“邓拓来了就好办了。”

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的邓拓，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因不能充分“理解”“引蛇出洞”的“阳谋”，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和报社内积极组织大鸣大放，遭到了毛泽东的“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严厉批评，受到冷落的邓拓不得不离开《人民日报》。

邓拓被罢官后，彭真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化教育工作。

邓拓到任后，彭真在10月初召开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以邓拓为首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的成员是：邓拓（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陈克寒（市委书记处书记）、蒋南翔（市委常委、高教党委第一书记、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高教部部长）、杨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教党委第二书记，后调科学院）、范瑾（市委常委、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程宏毅（市委党委、副市长）、廖沫沙（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赵凡（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张文松（市委常委、教育部部长）、张大中（市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陆禹（市委委员、工交部副部长）、李晨（市委委员、教育局局长）、王汉斌（市委候补委员、办公厅副主任）等13人，其中常务编委8人。

接着，邓拓抽调人马，着手组建《前线》编辑部，并确定编辑人员的分工：萧远烈，协助邓拓、张文松负责总的日常编辑工作，后任命为编辑部主任；许文，负责工业交通，后任命为工业组组长；吴瑞章，负责农业，后任命为农业组组长；李光远，负责思想理论，后任命为理论组组长；李筠，负责文化教育，后任命为文教组负责人；韩佳晨，负责评论。以后苏星曾担任过短期的编辑部副主任。《前线》从创刊到结束，除韩佳晨调走外，其余5人都坚持了下来。

关于刊物的名称，彭真亲自审查，对宣传部提供的名单仍觉得不满意，他曾提议刊物取名为《战线》。经过多次讨论，反复斟酌，直到11月4日，彭真才最后将刊物定名为《前线》。为此，他给邓拓写了封信：“邓拓同志：请你最后再和书记处同志们一商，刊物的名字是否即定为前线。”后来，彭真解释说：“前线”两个字有战斗性。“我想了很久，提出了这个名字，意思是北京什么工作都应当站在最前线”。于是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便有了个能体现北京市指导思想的响亮名字。彭真还亲自为《前线》题写了刊名。

那么，《前线》总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前线》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前线》是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它将用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指导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北京市党的组织及时地反映现实，指导实践，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

这个发刊词的构想体现了彭真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索与认识。1958年10月底，彭真在北京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发刊词要“同过去的文章不同，这次的锋芒要对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不良倾向，不是针对资产阶级”。“这个发刊词主要解决的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批判主观主义，即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会后不久，彭真将张文松、项子明、项淳一、王汉斌、张彭5人召到自己家里，详细口授了发刊词的内容。事后，依记录整理出了发刊词第一稿。彭真亲自动手改写，经过几次反复修改，终于写成《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

稿子写成后，彭真将其印发给蒋南翔、胡绳过目，以征求大家的意见。11月8日，彭真专门召集市委常委讨论发刊词。会上有人提出，发刊词中“他们太喜爱舞台上员外老爷的四方步了”这句话太尖锐了，最好改得缓和些。彭真说：“我就是要写的尖锐些，文章糊里糊涂没有棱角，我最讨厌了。我写这些东西，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我脑子里都有模特儿。”在讨论中，彭真还特意就他提出的“按客观可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这一口号，征求大家的意见，

李琪认为这个口号“(主客观)两方面都讲到了,可以。”

1958年11月25日,《前线》创刊号与广大读者见面。而时隔几十年后再回头细读这篇发刊词,益发觉得它的分量。

发刊词的第一个主题,是强调要正确认识主客观的关系问题。即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发挥主观的能动性,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这就要求人们在改造现实的实践中,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客观规律办事。

在1958年那个时代,提出这样鲜明的观点,确实不简单。发刊词锋芒直指与客观规律相悖的各种社会现实,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反映了彭真的胆识。“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做得对或者不对,必须采取马列主义的老实态度,都当作客观事物对待,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多就多、少就少,该怎样就怎样,严肃谨慎地对待。”这些彭真式的口气和用词,对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这篇发刊词的出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确思想与“左”倾思潮的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发刊词便成了“彭真独立王国的反党纲领”。

发刊词的另一个主题,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反对中庸主义、中游主义和对群众运动的吹毛求疵派。彭真在论及这些问题时,用词是非常尖锐的。例如他在谈到反中庸主义时,就正面指出:我们极少数同志也传染上马列主义的市侩、“乡原”作风。

创刊号发出后,有些读者来信请求解释“乡原”。邓拓于是让我写了一篇文章,解释它的出处及含义,最好与发刊词联系写。“乡原”一词最早出自孔子之口,孟子又做了一番解释。用现在的话来说,“乡原”就是贼光油滑、八面玲珑的市侩,是中庸主义者的别名。文章写出后,邓拓将原题《释乡原》改为《要识破“乡原”的真面目》,发表在1958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

对于这篇发刊词,邓拓是非常重视的。他一再地强调,发刊词是《前线》整个刊物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编辑部工作的准则。任何工作都必须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而实际上,发刊词也成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市委比较大的工作会议上,发刊词曾多次被印发学习,作为检查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个标准。

《前线》创刊号出来后,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安排创刊号的具体内容时,邓拓要求市委书记们每人写一篇,“这样创刊号才有分量,才能打响第一炮,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重视。没有这样重头文章是不行的。”《前线》第1期发行量达到18万份,以后基本维持在3至5万份左右。

#### ◇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家经济工作遭受了建国以来一次最大的挫折。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961年起。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这实际上是对极“左”错误的一次有力的拨乱反正。而“三家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则是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解决面临的严重困难,北京市委的态度是认真的积极的。除了认真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解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实际困难外,在思想文化战线,也作了不懈的努力,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反右倾扩大化的错案,坚决迅速地予以甄别纠正。邓拓是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在20世纪30年代曾写过《中国救荒史》。他对现实的认识更为清楚。

1961年6月三联书店重印此书时。邓拓在“绪言”中很尖锐地指出。“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在市委常委讨论如何克服困难时，邓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要有思想工作相配合，明确地提出了提倡读书的口号。1961年1月11日，北京日报社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讲话，有一段是这样讲的：要改变那种一下班就看不下去书的状况。报纸要提倡读书，方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开阔眼界。就不会斤斤计较。乔木同志让《人民日报》多搞一些世界风光，境界高一些，不要计算天天吃几两。现在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话说得很对，在困难时期，确实需要多读书，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克服物质的匮乏。

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的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最初是写《诗画配》。尔后在《五色土》副刊上开了《燕山夜话》的栏目。时间是1961年3月19日，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生命的三分之一》，大力提倡读书。

《燕山夜话》出刊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前线》编辑部的同志也都觉得文章写得好，并认为邓拓既然是《前线》的主编，应给《前线》写文章，于是直截了当地向邓拓提出，让他在《前线》上开个专栏。邓拓开始没答应，后来我们一再磨他，邓拓说：同时开两个专栏，恐怕有困难。这样吧，我找些人一块写，行不行？于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就被《前线》编辑部的同志拉上马了。

记得是在1961年9月20日左右，《前线》编辑部约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写稿，在四川饭店吃了一顿饭。当时边吃边谈，定下来四件事：一是专栏的名称。邓拓说，咱们三个人合开一个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吧。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的名字。邓拓还提到过，“札”字最好用老写的“𠂔”。二是署名的问题。邓拓提出就效仿马铁丁等合作的办法每人取一个字如何。吴晗取吴字，邓拓的笔名为马南屯，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于是叫吴南沙。后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文章的写法。文章不要太长，以《前线》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己选择，按各自的专长随便写。每期上一篇，轮流撰稿。另外，指定我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

到1962年9月或是10月的时候，“三家村”又第二次在四川饭店碰头，请吃饭的目的主要是催要稿件。编辑部主任萧远烈简要说了读者对专栏的反映，希望三位抓紧按时供稿。然而这次会面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稿子照样难催。缺稿的时候，只好将《前线》现有的稿子补上。因此，《三家村札记》198篇文章中，有5篇不是邓、吴、廖写的。其中李光远写了《从善如登》，李文写了《关心业余创作》，张世绩写了《禁于未发》。有两篇是我写的：《不平等的平等》、《谈海派》。这两篇后来被姚文元的批判文章作为黑话摘引上了。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共坚持了3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杂文专栏难以持续下去。吴晗给邓拓写了封信，说题目难找，工作也忙，建议不写了。邓拓、廖沫沙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家村”，就应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它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但是八大的思想没有能够贯彻下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思潮进一步泛滥。从1958年底至1959年7月，中央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来纠正经济建设方面“左”的错误，文化领域也对“左”的偏向提出批评。但是几次纠偏，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庐山会议后“左”倾错误又重新泛滥，国民经济出现了3年严重的困难。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也使文化科学界广大知识分子思想压抑，心情不舒畅。为此，中央在1961年实行八字方针。1962年，“七千人大会”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作了一次比较集中的清理。在调整经济、文化政策期间，许多带有法规性质的条例相继出台，诸如《农业60条》、《人口及粮食问题9条》、《手工业35条》、《商业40条》、《科研14条》、《高教60条》、《工业70条》和《文艺8条》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就是这调整时期的产物，它是思想文化回归到正确路线上的一种表现，和《前线》发刊词一脉相承。

当然。《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并非每篇文章锋芒都直指无知、不实事求是、轻视教育和文化传统的时弊，但总的倾向是可以肯定的。在实事求是精神的召唤下，“三家村”把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凝练成文字，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左”倾的错误，从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引起了交锋。

具体到文章中，有几件事值得记述。

《三家村札记》最初发表了吴晗的《古人的业余学习》和廖沫沙的《从走路和摔跤学起》，邓拓对我说：没有打响，言不及义。当时我很不理解，只觉得那两篇文章写得不错嘛。不久，邓拓写出了《伟大的空话》。对当时说大话、说假话、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思想作风给予了有力的抨击。

廖沫沙《怕鬼的“雅谑”》发表于赫鲁晓夫焚毁斯大林遗体后不久。写完这篇稿子后，廖沫沙打了电话让我去取。后来他告诉我，此文是从反修的角度入手的。廖沫沙还写过《向老虎求教》、《看看历史上的“蠢猪”》，但是当时有规定，反修的文章一律由中央报刊发表。从这个角度考虑，《三家村札记》没有采用。

1962年5月，吴晗在《前线》第10期上发表了《说道德》，认为对统治阶级的道德可以批判地继承。稿子送来后。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因为说道德，总不能割裂传统。但这篇文章在对马列词句的引用以及理论的阐述方面有不够周严的地方。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一个名叫张文清的读者来信，他从学术角度，对吴晗的《说道德》提出不同意见。我把信送给邓拓，邓拓说给吴晗看一看。吴晗阅毕，又写了一篇《再说道德》。于是张文清再来信，与吴晗争鸣。后来，编辑部给张文清去信。声明他的稿件已给吴晗看过，并将稿子送给一位专门研究道德的同志，请他提出意见，《前线》不再刊登了。不久，《光明日报》发表了别人的文章，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看法，吴晗于是写了《三说道德》，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因发表了两说道德，在批“三家村”时，《前线》被严厉地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并扣上了“包庇吴晗压制革命群众言论”的帽子。

邓拓的《专治健忘症》发表后，曾收到一个名叫戚益的来信，信中质询邓拓，健忘症到底指什么，是否有影射。我把戚益的信拿给邓拓，邓拓写了批语：“文章是就事论事。关于杂文的写法，确实是值得探讨的。许多读者也都提出过这类问题，本刊发表的杂文，比较强调正面谈

问题，不太主张过于隐晦和影射的方法”。根据邓拓的批语，我加上其他读者的一些反映，给戚益回了信。这件事后来也成为《前线》压制批评、包庇“三家村”的黑材料。

#### ◇ 批判初起

经过调整，到1962年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3年困难的紧张局面得以缓解。但是在贯彻调整方针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与“三面红旗”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角度，重提阶级斗争，并在抓阶级斗争的前提下，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左”倾思想重新抬头，并向正确思想进行反攻。文艺界也接受并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关于在文艺战线和社会科学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5月，江青在上海组织了围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有害论》。结果，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有鬼无害论》遭到了批判。

《有鬼有害论》发表后，廖沫沙很被动。北京市委不能不管，于是在统战部组织了内部批判。会上廖沫沙作了检讨，说自己的文章有些文字用得不恰当，不应当宣传鬼等。在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廖沫沙又再次检查了错误。廖沫沙写书面检查的时候，找过我和《北京晚报》的同志，请我们帮他找些相关的材料。

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查刊登在《北京晚报》上，编者按说他的检查是诚恳的。当时北京市委觉得用这个办法就可以把账还清了。彭真也说过：“廖沫沙关于《有鬼无害论》的检查做得不错。别人要再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廖沫沙在统战部实际上已靠边站，后来到了北京郊区搞“四清”去了。

然而中央上层对“三家村”的批判仅仅是开了个头。1964年8月，华北局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彭真、刘仁都前往参加。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从北戴河打来的长途电话，让我在两天内赶写一篇批判吴晗道德继承的文章，写完后送往北戴河。同时，刘仁、邓拓电召吴晗到北戴河写检查。

我的文章写完后，送交北戴河由邓拓修改定稿。过几天，稿子返了回来。文章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就“道德继承论”与吴南星同志商榷》。署名是金世伟（北京市委的谐音），前面还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金世伟同志的这篇文章，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了原则性的严肃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发表于本刊“三家村札记”栏内。“三家村札记”是杂文专栏，由几位作者轮流撰写，均署名吴南星。现在看来，我们当时采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妥当，因为实际上文章既非集体创作，而作者意见又非完全一致。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是经过本刊编辑部看了的。我们当时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没有从“革命呢还是继承呢”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考虑，对于吴南星同志的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节的修改，就同意发表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做了无原则的迁就，也是错误的。……

金世伟的文章送回来后，我得到的指示是：“等那边的话再发”。直到1966年4月，北京市委在组织对邓拓的批判时，刘仁在发言中提及到金世伟这篇文章，并说了这句话：对吴晗，中央认为不公开批判。

现在看来，对吴晗的批判从1964年8月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最高领导人的授意。否则，北京市委不会采取如此阵势，以“金世伟”之名，加了编者按作自我批评和检查，北京市委当时顶着很大的压力。金世伟的文章被扣下不发，并不是北京市委的主张，而是中央考虑所做出的决定。究其原因，也许是最高领导层觉得公开批判的时机未到，也许是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

1965年初，江青以搞戏剧改革为名，到北京进行调查研究。市委指定宣传部长李琪陪同。据李琪的夫人李莉回忆，江青很难侍候，很霸道，不讲道理。她以特殊的身份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企图砍杀北方昆剧院和地方剧种，不许老演员登台演出。当时北京市委觉得这样的安排不妥当，对江青进行了抵制。李琪对江青很有意见，给彭真写了封信。说江青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唯我独尊，简直比武则天还难侍候。后来，别人告诉李琪：江青来北京就是专门来摸北京市委这个“老虎屁股”的。不久，“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义”、“眼中无我”、“破坏戏剧革命”等大帽子纷纷而下，矛盾和斗争进一步激化。

江青北京之行的同时，她在上海方面则秘密开始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台，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 ◇ 最后的抗争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文汇报》如此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民主同盟的负责人和著名学者，确实非同寻常。

上海的做法，违反了1965年“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的规定。彭真指示《前线》、《北京日报》不要转载。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吴晗立即给市委送来了他1959年写的《论〈海瑞〉》的底稿，并附信说明他写关于海瑞的文章是胡乔木转达授意写的，并根据乔木的意见在《论海瑞》一文中增添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

11月13日，邓拓召集范瑾、李琪研究吴晗《海瑞罢官》的问题。让我也参加了。邓拓在会上说：“不知吴晗反应如何？”当即他给吴晗挂了电话：“你看了文章，怎么样？”吴晗说：要是学术问题，我可以跟他辩论；他扣政治帽子，这是陷害。我1959年写的文章，怎么知道1961年有单干风？邓拓也觉得吴晗讲的有道理。在这次会上，邓拓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听说《海瑞罢官》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不知是真是假，咱们也不摸底。

最后，会议决定《前线》和《北京日报》开展学术批判，给《北京日报》抽调一批人组成学术批判小组。《前线》分工主要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指定我为《前线》学术批判小组的负责人。

到了11月底，随着形势的发展，拒载姚文已不可能。11月28日，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周扬商讨北京各报刊转载姚文的问题，决定在11月29日见报；为避免震动太大，只《北京日报》一家转载；转载时，加了彭真审定的编者按语：“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就该展开讨论。”11月30日，《人民日报》也刊载姚文，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加上了按语，希望通过辩论，能够进一步开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

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后，北京市委仍力图将气势汹汹的批判控制在学术范围之内，抵制江青、张春桥等人把批判向“左”的方向推进。

1965年12月2日，邓拓、范瑾召集《北京日报》、《前线》学术批判小组人员开会，传达北京市委的基本态度。邓拓说：对这次争论，要有个基本态度。接着他解释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3个按语的不同之处。邓拓说：《解放军报》按语鲜明，是因为军队内部不搞百家争鸣和学术讨论。但是现在吴晗的问题不是已有了结论，不是已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不是一批判《海瑞罢官》，吴晗也罢官。吴晗本来不是写戏的，别人请他写，但写着写着就陷进去了，就自比海瑞，就像郭老自比蔡文姬，孟超自比李慧娘一样。李慧娘确实是骂贾似道的。吴晗的问题看发展，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再说。

邓拓说，现在首先当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一个良好的风气，先当学术问题来搞，即便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稳当。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分开，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当学术问题来处理。要把不好的风气扭过来，形成毛主席讲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也不能回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是一批评就不得了，就有覆灭的危险，就不能工作了。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过火的批评也应纠正，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首先要缓和这个局面。应该有人写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过火；吴晗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确实错了。这场学术界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它牵扯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道德观点评价问题等等。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问个为什么你那时候要写《海瑞罢官》就完了。不是一棍子打死吴晗，不要一边倒，倒向姚文元，或者倒向吴晗。要实事求是，辨明是非，就按《北京日报》的按语搞。对写文章的要求，总的是言之有物，有针对性，有资料，有观点。

邓拓还谈到文章的具体分工问题。邓拓提出研究《海瑞罢官》，大家可以研究剧本本身的问题，材料观点都要站得住，姚文元的引文就有毛病。吴晗讲他1959年写《论海瑞》，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来马连良请他写剧本，改了7稿，1961年8月8日定的稿，同年上演，演到1962年8月。他原来题目是写海瑞，第4稿才改为《海瑞罢官》，是大家提了意见才改的。为什么写罢官，因为周信芳有海瑞上书、海瑞背纤。为了不重复，才写的海瑞罢官。我们要从这里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他对海瑞很感兴趣，最突出的是什么？原先以退田为主，后来改为除霸为主，但为什么要改为海瑞撤职呢？当时剧本的中心是什么？为什么突出这件事？1961年定稿时为什么不考虑当时的形势呢？吴晗的历史观也有点儿问题，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要弄清楚，道德问题、历史和历史剧的问题都是题目。海瑞是中小地主的代表，问题是把他划到哪个阵营去。

12月初，彭真指示邓拓写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邓拓写作前让我把金世伟的文章找出来给他。邓拓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文章前加了《前线》编者按语，指出：赵凯同志的这篇文章，从吴晗同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谈到他的道德继承论的若干基本观点，提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与吴晗同志商榷。赵凯同志把“道德继承论”和海瑞罢官联系起来讨论，我们赞成这样做。希望读者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烈参加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有关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的科学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该按语的其他内容与金世伟文的按语基本相同。

邓拓把文章送交彭真，彭真认为太简单了，让他再改写。邓拓重新改写，最后经市委书记处传阅，彭真定稿，署名向阳生，12月12日在《前线》、《北京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同时发表。这篇文章以学术讨论的语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发表时原文的编者按删去不用。邓拓曾跟我说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过去都发表过错误的文章，也没有做自我



批评，所以彭真在定稿时没有采用。

向阳生文章发表后第二天，根据北京市委的基本调子，《北京日报》刊出了我写的《对待〈海瑞罢官〉能操两可吗？》。12月25日，《前线》发表我署名为艾力耘的文章：《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评价历史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此文被说成是“继向阳生《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之后，抛出的又一篇为吴晗救命的大毒草”，“一个劲地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往所谓‘纯学术’问题上拉”。同一天，《北京日报》还刊登了我署名为“险峰”的文章《百家争鸣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当时《文汇报》曾就《北京晚报》“称兄道弟”一组文章，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展开讨论，同时发表了署名劲松的批判文章。邓拓看过后对我说：“劲松这篇文章有来头，是张春桥写的。”“这种情况使北京很被动，我们也要赶快批评一下。”我的文章写完后，李琪称赞道：“真是南有劲松，北有险峰！”

在赶写向阳生文章的同时，邓拓还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信给吴晗，让他迅速写一个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该充分发表，不要顾虑重重。”于是吴晗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就有关《海瑞罢官》中的若干学术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辩解了《海》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在某些问题上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吴晗的检查刊发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与此同时吴晗还写了关于道德问题的自我批评，邓拓授意我写一篇评论文章，署名严问，指出吴晗仍在坚持道德继承论。这与吴晗关于道德问题的自我批评一同发表在1966年《前线》第一期上。

但是这场有关《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开始并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一场预先策划好的政治阴谋，搞吴晗只不过是个突破口罢了。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邓拓感觉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1965年12月19日，在《前线》组长会上，邓拓曾指出，海瑞问题的文章不止是一个人写过的，早在1959年《解放日报》就发表过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并且加了编者按说，海瑞的故事流传很广，这个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把海瑞吹捧了一番。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文汇报》在1965年12月重新登出了蒋文，但没有同时刊载《解放日报》的编者按。当时邓拓很不服气，要批判就都批判，现在发表蒋文，却又留了一手自己的按语，他怀疑这里可能有名堂。

会议之后，邓拓让我向吴晗查寻蒋星煜是上海的什么人，并让他的秘书写个读者来信寄《文汇报》，质问《解放日报》也发表过吹捧海瑞的文章，为什么不先检查自己就批评别人。但信最终没有发出。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和陈伯达等人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海瑞罢官》的主题从“退田”变为“罢官”，吴晗的问题，具有了反党的性质，政治批判的分量加重了。

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召集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仍力图把学术讨论文章的局势控制一下。许立群说：“按规定有关的批判文章，要送到中宣部办公室。”这次6报刊编辑部会议我参加了。根据邓拓的授意，我发言说：我们没有计划卷入这个讨论，《前线》篇幅有限，当前工作很多要宣传，要面向工农兵，搞通俗化，我们已刊载了3篇文章，主要是还账，因为我们过去发表了两说道德。我们的文章引出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有了批判的靶子。以后如果有对吴晗问题政治性结论文章，我们转载。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就批判吴晗的情况和继续开展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其目的仍是试图约束这场运动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的性质；规定采取放的方针，反对自以为是。

《二月提纲》发向全国后，学术批判的空气上升，政治批判有所抑制。1966年2月18日、21日、24日，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传达贯彻执行。

在这一时期，有件事须交代一笔。这就是1966年2月初，关锋夜访邓拓。邓拓当时感到很奇怪：我和关锋根本没有来往，他找我干什么呀？第二天，邓拓告诉我：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受康生的指使，关锋跑到邓拓办公室，对邓拓施加压力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他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吴晗讲继承忠孝等不是抽象的，有其具体内容，讲孝是骂我们的。关锋接着提出，劳动人民的道德可以继承，却又非两面性等等一些意见。

邓拓对关锋的答复是：《北京日报》不是我管的，范瑾和书记处同志要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我就写了。原来曾想在文章中做些检查。邓拓还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还是谈了。

后来邓拓告诉我，关锋那天还对他说了不少吹捧的好话。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康生一伙的用意何在？

1966年2、3月间，毛泽东同意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但也批准了江青一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炮制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对准了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界。显然，当时真正代表毛泽东意图的，是《纪要》。1966年3月1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揭了彭真和北京市委的盖子，定《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4月中旬，彭真在政治局开始受到批判攻击，《二月提纲》遭到否决的命运，北京市委只好以不断检查的方式，来摆脱益发困难的处境。

1966年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单位，在市委交际处对邓拓进行一定范围的批判。这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但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他文章都是正确的”。

这样的举动显然过不了关。北京市委的党报党刊迫不得已地自己出来组织批判。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3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刊发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但是时隔不久，《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在5月8日发表了高炬、何明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北日报》的4·16按语被认为是对“三家村”的“假批判、真包庇”受到了批评。紧接着《五·一六通知》发表，揪出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北京市委被改组。从“三家村”身上点引的“文化大革命”的厉火开始蔓延全国。

1966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全面开火，

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四人帮”的文痞们又发表了诬陷邓拓为叛徒的文章，5月18日，邓拓以死抗争，结束了他年仅54岁的生命，正如他：“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表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宁折不弯的铁骨铮铮。之后，北京市委被改组，吴晗、廖沫沙继续被批斗、关押，吴晗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

□《炎黄春秋》 2010年12期

~~~~~

【史海钩沉】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

• 倪天祚 •

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主席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总人数约1100万。这项工作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具体工作由北京军区郑维山、傅崇碧和北京市委吴德、马力、牛连壁等同志负责，并成立了群众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我当时是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参与组织了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 八次接见的情形

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名同学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清华附中校园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100多名同学在上面签了名。接着，又贴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等大字报。7月28日，这些大字报被转给毛主席。8月1日，毛主席给这些红卫兵写了信，此信成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一。在这封信中，毛主席多次说了“热烈支持”红卫兵的话，从而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组织起来，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随后，全国红卫兵开始大串联，并逐步集中到首都北京。这样，从1966年8月到11月，毛主席共八次、分十批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

第一次接见，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7时半，组织了80万红卫兵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当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奏起了《东方红》乐曲。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之后，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发言。大会结束后，红卫兵和群众队伍开始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毛主席不停地挥着手里的军帽向广场上的人们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在广场上空回荡。这次会见还组织了15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分两个方队，在城楼东、西平台上受到毛主席的直接接见。就在直接接见时，北师大附中一名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这次接见时，毛主席从早晨5点多就到了天安门，而且在城楼上一站就是6个小时。这也是毛主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穿军装。当时因来不及制做军装，是从一位警卫战士处借的。

第二次接见，在8月31日下午5时，组织了70万人，主要是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由于第一次接见时有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于是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形式做些调整。就是请毛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林彪先讲话，后由周总理讲话。当时，林彪戴上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讲话结束后，红卫兵和群众队伍从天安门前通过，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第三次接见，在9月15日下午5时，组织了80万红卫兵，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过程与第二次接见大体相同。毛主席等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下午6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第四次接见，在10月1日，与国庆17周年庆典结合在一起。这次组织了110万红卫兵和群众参加。天安门前红、灰观礼台还安排了观礼人员。上午10时5分，北京市代市长吴德宣布大会开始，奏国歌、鸣礼炮后，林彪发表讲话。随后，由工农兵和学生代表、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外国来宾发言。之后，开始群众游行。游行队伍前面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大幅标语牌。后面是7.5米高的毛主席身着军装、一只巨手伸向前上方的巨大塑像。再后面是《毛泽东选集》的巨大模型。由2万多名人民解放军士兵、民兵和红卫兵组成前卫队，护卫着国旗和国徽的人民解放军挎着冲锋枪，个个高举《毛主席语录》，踏着整齐的步伐，有节奏地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走在群众游行的最前面。红卫兵抬着《毛主席和红卫兵在一起》的巨幅油画行进。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外地和首都师生组成的游行队伍，编为140人的横排面，分成九路纵队，人人手持《毛主席语录》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的检阅。这次有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分批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身旁参加节日庆典。大会在下午3点多钟结束。

第五次接见，在10月18日中午12时50分开始。这次接见是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这天，从天安门西标语塔的马路上起，途经东长安街、建国门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至北太平庄的马路上，排列了150万名红卫兵，全程约50里。毛主席等乘敞篷车，从红卫兵的夹道中间徐徐通过。红卫兵欢呼连天，掌声雷动。由于红卫兵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在原地、原位秩序井然地接受检阅、接见，整个接见进行得很顺利，只用了1个小时。

那时快到初冬季节，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冷，有的红卫兵没有御寒的衣服，在京吃、住都成问题。根据中央精神，要动员他们离京回原地。但红卫兵说：没有看到毛主席，坚决不回去。因此，又组织了三次接见。

第六次接见，于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次接见采用了红卫兵游行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陈伯达宣布大会开始，林彪讲话，随后220万红卫兵开始缓缓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接见。这次接见到下午2时结束。由于结束时还有一部分红卫兵尚未通过天安门，周总理指示，未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放在下次再组织接见。

第七次接见，因人数多，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接见在11月10日上午10时，接见地点仍在天安门。在《东方红》乐曲中，毛主席等登上天安门城楼，陈伯达宣布接见大会开始，广场集合了30万名红卫兵，另有30万名红卫兵乘坐卡车（每辆车上站50人）分成五路纵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数量不多，经周总理同意，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各军兵种中抽调了一些卡车。当天，有6000辆卡车载着红卫兵接受检阅。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眼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返回再次前行。下午3时3分时，毛主席走到扩音器前高呼“同志们万岁！”站在卡车上的红卫兵和在广场的红卫兵情绪更加高涨，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次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第二批接见在次日，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从木樨地至八王坟约2.6里的大道上，排列了130万红卫兵和师生。毛主席等在下午2时30分乘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和师生，共用时42分钟，3点半结束。

第八次接见，分两批、三处地点进行。第一批接见在11月25日上午11时半，组织了

7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举行群众游行。毛主席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康生宣布大会开始，接着游行队伍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开始游行，接受毛主席检阅，下午3时半结束。第二批接见在11月26日，分两处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一处是在市区从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马路上，经西长安街、复兴门大街，到钓鱼台东门马路上，全长6500米，组织了80万红卫兵。下午2时30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主席等乘敞篷车，从红卫兵中间缓缓通过，检阅了全部队伍，3时结束。另一处是在西郊机场，组织了110万红卫兵，也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毛主席等乘敞篷车，在市区检阅后，直接到西郊机场，继续检阅，下午5时结束。

◇ 组织工作遇到的几件事

1966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是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当时成立了指挥部，具体工作由北京市委负责。我是群众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接见的具体组织工作，经常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工作。在汇报工作时，周总理问得非常具体仔细：如问组织接见红卫兵队伍密度，每一平米站几个人，前后厚度有几排；接见沿线设置多少个供红卫兵队伍使用的厕所，通向厕所的通道有多宽，够不够用；沿途安置了多少个自来水笼头，红卫兵饮水够不够用；接见当天红卫兵队伍什么时间出发，什么时间到达集合地点，交通工具怎么安排，等等。

周总理对红卫兵非常关心，指示一定要减少红卫兵的疲劳，把组织工作做好。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红卫兵队伍经过天安门时都想多看看毛主席，行进速度往往很慢，接见的的时间不得不延长。为此，周总理提出，要减少毛主席和红卫兵的疲劳，行进速度要快一些，接见的的时间要短一些。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采取了用卡车载人的办法，让红卫兵坐在大卡车上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这样做，速度是快了，但车辆载人有限，接见一次总人数不多。后来又采取夹道的形式，毛主席等乘坐敞篷车，从夹道中间通过，这样速度就快了。如最后一次接见，共组织了260万名红卫兵，不到两小时接见就结束了。

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采用了红卫兵游行通过天安门的方式，从上午10时开始接见，到下午2时红卫兵队伍尚未完全通过天安门广场。当时，周总理把我从天安门城楼下的指挥室叫到城楼上，询问还有多少红卫兵未通过天安门，如全部通过还需多少时间。我向周总理汇报：红卫兵队伍已通过三分之二，剩下还有三分之一，按目前行进速度，至少还需要两个半小时。周总理听后说，接见时间太长了，不能再继续进行。指示今天的接见到此结束，剩余的队伍下次再组织。我们就按周总理的指示，做了结束安排，未通过的红卫兵队伍按原路返回各自住地。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组织工作难度很大，每次接见都要调遣队伍，牵涉到北京各区县上千个单位、上百万人的行动；而且变化多，接见时间涉及到安全、天气和领导人的时间安排及健康等不确定因素，有时一个方案变动多次才能实施；并且任务重，组织一次接见，要准备、忙碌好多天，开夜车是家常便饭。记得有一次，我五天五夜没有怎么睡觉，幸亏那时年轻顶得住。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但在整个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插曲”。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初，为做好组织工作，我们起草了一些口号，报送中宣部审阅后，由北京市委印发。由于这些口号较长，为便于红卫兵呼喊，中宣部领导审阅时便把口号修改得比较简短，去掉了一些形容词。如有一条原来写的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中宣部修改为毛主席万岁。当口号发给红卫兵时，有红卫兵认为口号有问题，于是在接见时，有3000多名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造反”，次日又有200多名红卫兵到北京市委“造反”，要市委交代口号的问题，批斗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力（当时是组织接见红卫兵指

挥部的领导)，我也被陪斗。我们把红卫兵请到市委会议室，反复做他们的工作，详细讲明口号起草的过程以及中宣部修改口号的经过，之后他们才离开市委大楼。这些红卫兵又认为是中宣部的问题，当天晚上又到中宣部“造反”，批斗中宣部领导，并让马力陪斗。红卫兵闹了一个晚上，才离开中宣部。此后，我们吸取教训，修改了口号并报请周总理审定。以后几次接见红卫兵，都用的是周总理审定的口号，印发下去，没有再发生问题。

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也出了一些问题。那次因外地在京红卫兵有190万人，城区没有大场地，周总理决定分两处接见，一处是城区从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马路上，经西长安街、复兴门大街，到钓鱼台东门马路上，接见80万红卫兵，由北京市委负责组织；另一处在西郊机场，接见110万红卫兵，由北京军区负责组织。那次接见采用群众夹道的形式。接见那天下午3点钟，毛主席等乘坐的车队通过城区夹道队伍后，直接到了西郊机场。当时城区的接见只用了半小时，接见结束后我们就安排队伍疏散，很快就疏散完毕。因怕出事故，大约在下午4点多钟，我又赶到西郊机场北京军区现场指挥部。当时毛主席已接见完毕。北京军区指挥部的同志认为毛主席乘坐的车队离开只有半个多小时，如疏散了队伍，怕堵住毛主席乘坐的车辆，没有马上疏散。我提出建议：根据以往情况判断，毛主席乘坐的车辆现在已进入中南海，应该马上疏散队伍。这时已是下午近5点钟，再晚些天黑，路况又不好，有的地段马路上没有路灯，加之人多拥挤，很容易出问题。但是，他们坚持己见。我再次说明，他们仍不同意我的建议。我不好勉强，只好尊重他们的意见。随后，我就回天安门指挥部了。但我刚到天安门指挥部，机场指挥部就来电话说：“一辆乘坐红卫兵的车翻在桥下，有人员伤亡。”我立即赶到事故现场，看到那里周围没有路灯，车辆是从没栏杆的一端翻到河里的。那时，受伤的红卫兵已被送往医院。后来，有两名红卫兵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总的来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工作遇到过很多难题，也有值得总结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按中央的要求完成了任务。这主要归功于周总理的领导和指挥。周总理对接见的组织工作要求很严，标准很高，抓得很细，指导很具体。如每次接见的方案，都是周总理亲自听取汇报，有时一次接见要开多次会议进行准备、研究。这些事虽已过去了40多年，但我仍记忆犹新。

□ 《百年潮》2010年11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